

“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综述

正值傅斯年先生去世60周年之际,为了缅怀傅斯年的学术志业,推动和深化傅斯年研究,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和台湾大学共同主办了“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以此来纪念傅斯年先生。大会于201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美丽的江北水城——聊城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和聊城大学等单位,以及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等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共向大会提交论文30多篇。与会学者围绕傅斯年学术思想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以此来告慰这位杰出的学人。

开幕式上,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就傅斯年任校长期间,对台湾大学进行的改革、提出的校训等事迹进行了介绍,赞扬傅斯年对台湾大学以及台湾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就傅斯年参与创立中央研究院,并担任了25年的史语所所长的经历进行了介绍。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女士深切回忆了何思源与傅斯年之间的友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耿云志认为傅斯年既能做学问,又具有组织才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内容主要涉及傅斯年研究述评、傅斯年学术思想再研究、傅斯年教育思想再研究、傅斯年的社会活动、傅斯年家史、傅斯年与同仁的交往等六个方面。会议紧紧围绕这些主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和交流。

潘光哲《关于“傅斯年研究”的思考:以王汎森〈傅斯年:史学与政治之间的一生〉为起点的讨论》指出,了解当时整个学界学人们的思想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傅斯年。苏全有、郑伟斌《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就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来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内容和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李宪堂《一扇瞻望星空的窗口:评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与思想研究〉》认为马亮宽新著以扎实的资料,对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活动和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张太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由近年来傅斯年研究看人物研究的新视野》指出,对于人物的研究,应当把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路径,则可以无限扩大人物研究的范围。在这种研究取向之下,傅斯年的言说或活动成了一种线索、道具、媒介、切入口或参照物,以此可以追溯学术传统和表达现实关怀,可以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甚至可以重新认识重大社会运动乃至整个历史的发展,是可谓由“知人”而“论世”。

傅斯年学术思想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原祖杰《使命感与历史观: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历史语境》认为,探究傅斯年史学思想,除了分析其史学主张以外,还要考虑反映傅斯年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面的历史语境。罗志田《傅斯年是否证而不疏》指出,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观点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运用,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从搜集到运用的整个史料处理过程,都牵涉到一般所谓的“史识”,愈到后面的环节就愈明显。若把对史料的处理提高到史识的高度来认识,或更能理解傅斯年的意谓。欧阳哲生《新学术的扩展:以傅斯年〈史语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讨论》具体考察了史语所的工作方针、组织结构、学术工作的开展和学术成果等,指出傅斯年以新学术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奠定了史语

所的特殊地位。肖建新《“史学便是史料学”新论》认为,这一学说既是理念,也是方法,既指向历史学科的构建,更指向历史的本体,而后者所占比重大。晁中辰《学术与学风:再谈傅斯年先生的“史学便是史料学”》亦认为,傅斯年这一论断,它不仅对史学研究,而且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学风。杨朝亮《〈东北史纲〉:中国史界第一部东北地区史》阐述傅斯年与学者合撰《东北史纲》一书的背景与意义。唐明贵《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通过对傅斯年在《诗经》方面所提出的诸多特异见解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推动了现代《诗经》学研究的发展。张峰《傅斯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认为,傅斯年所倡导与领导的考古事业,不仅对重构中国上古史意义重大,而且改写了当时中国人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刘义峰《傅斯年与甲骨学》论述了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期间对甲骨学的发展的三个方面的推动:对甲骨文资料的发掘和保护;对甲骨学成果进行研究和述评;傅斯年史学思想对甲骨学的影响。吉开将人《傅斯年与日本学者:在国际学术竞争中的考古事业》运用一些至今未被关注的相关史料,揭示了史语所首次殷墟发掘之前,在民国学术多元开展的情形下,日本学者和史语所学者之间,围绕着中国考古的主导权,曾有明显的竞争关系。杜靖《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介绍了中研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始末,指出其对于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影响。石莹丽《两种科学化史学的交替与对立:从梁启超与傅斯年对历史统计学的态度说起》认为,二人在看待历史统计学上截然相左的态度其实反映了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两种科学化史学的交替与对立。交替的原因既是时代环境使然,又受两派舵手性格影响。

对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探讨是本次会议的又一特点。李剑萍《校长领导特质与大学变革研究:基于北大代校长傅斯年的个案研究》、左玉河《傅斯年的大学理念及大学研究院构想》、马亮宽《试论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考察了傅斯年作为教育家的一面。

还有许多学者就傅斯年的社会活动、傅斯年家世、傅斯年与同仁的交往等进行了探讨。关于傅斯年社会活动的论文有魏聊《傅斯年式的“革命”》和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等。有关傅斯年家世的论文有朱亚非、卢忠帅《明清聊城傅氏家族与地方社会》和李泉《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等。傅斯年与同仁交往的论文则有李关勇《柳堂与傅斯年父祖二代交游鄙视》、石兴泽《现代史学巨擘傅斯年与陈垣的交往与情怀》、张辉《傅斯年与周作人》、翁有为《傅斯年、胡适与陈寅恪、吴宓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对《吴宓日记》所载史料的梳理,对傅斯年、胡适、陈寅恪和吴宓四者之间纷繁复杂关系进行了考究,考察和透视出民国时期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此外,一些学者就傅斯年的志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孟祥才《中西文化精华铸就的品格:简评傅斯年的伦理道德指向》认为傅斯年的品格操守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能够广泛吸收中西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并将其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落实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张辉《二十一世纪视野中的傅斯年及其志业刍议》从四个方面对傅斯年及其志业进行阐述,认为傅斯年是一名真正的智者,一位难有的国士。竹元规人《“历史”与“语言”还是“历史语言”:试论傅斯年关于 philology 的思想》认为,傅斯年将 philology 与思想史、文化史结合,意欲阐明推动民族文化形成的动力。安作璋《傅斯年与齐鲁文化》认为,傅斯年对齐鲁文化情有独钟,所

论皆有独到之处。

本次会议紧紧围绕傅斯年学术思想展开,讨论显得热烈而又不失规范,表现出良好的学风和会风。随着学者的不断努力和更多后学的参与,傅斯年学术思想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杨朝亮)

“纪念张舜徽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2届年会”会议论文综述

2011年6月22—23日,“纪念张舜徽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2届年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数十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50余名学者与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发来贺信,高度评价了张先生的学术造诣以及他对社会、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在发言中认为张舜徽先生是有绝大气象的大儒,“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人物”。有着“成其大”、“得其通”、“文笔盛”的学风特点,才、学、识三者兼于一身,堪称20世纪中晚期国学家的典范。

本届年会为期两天,会前出版了两本纪念张舜徽先生的著作,一是戴建业主编的《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收文30篇,前有熊铁基先生的《序》,对论文集评价颇高。如王玉德《试论张舜徽与郑玄——兼评〈郑学丛著〉》、谢贵安《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张三夕《高山仰止——读〈切庵学术讲论集〉札记》、程水金《先秦道家起源与老庄异同论——兼评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汤江浩《〈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管窥》、戴建业《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与〈清人笔记条辨〉》、陈燕妮《通人·通才·通学——读张舜徽〈爱晚庐随笔〉》、韩维志《例释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的“辨章”“考镜”意识》等文,在阐发张先生学术著作的价值方面都很见功力。

二是周国林主编的《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收文73篇,第一类是回忆或纪念性的文章,共19篇,如章开沅《良师·难友·芳邻——难忘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朱祖延《怀念张舜徽先生》、熊铁基《向张舜徽先生学习什么》、冯天瑜《舜徽先生二三事》、马良怀《一次难忘的记忆》、张家璠《学会发展忆会长》等文,通过回忆与张舜徽先生交往过程中的点滴小事,彰显先生的人格魅力、治学态度与学术光芒。第二类是对张先生学术的研究,如董恩林《张舜徽先生经学思想述》、方向东《浅论张舜徽先生的礼学成就》、刘固盛《论张舜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点》、李晓明《张舜徽先生对汉代诸子的研究》、朱杰人《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朱子情结》、赵振《张舜徽先生方志学理论述论》、罗家祥《张舜徽先生与宋史研究》、王继如《张舜老与敦煌学》、谭佛雏《张舜徽先生文论三题》、王玉德《试述张舜徽对〈周易〉的研究与贡献》、肖海燕《张舜徽先生对朱熹朴学的评价》等,论域遍